

伊格尔斯访谈录

贺五一

2012年12月初,我利用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学之机,到布法罗拜访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伊格尔斯是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荣退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中国世界史学界对他并不陌生,他的一些著作如《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以及最近他与王晴佳合著的《全球史学史》等已经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在拜访期间,我和伊格尔斯教授就他的人生经历、学术观点、他对当今世界的看法以及他最近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等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其学术观点包括对法国年鉴学派的评价、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产生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他计划编纂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以及当今世界的民主、人权、和平、种族主义等有关问题。

贺五一: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思想史,您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作为您的终生学术追求?按照您的理解,思想史和事件的历史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有什么不同?

伊格尔斯:这个问题需要用很长的篇幅,甚至是一本书来回答。我将给你发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广泛地介绍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以及什么时候成为思想史学家的。我总是对过去非常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我的兴趣在语言学方面。1940年当我已是13岁时,我加入了一个组织,就是现在所称的协会,这个协会倡导战后世界各民主国家的联合。我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了推进这种联合,我开始学习各种语言,包括学得不怎么好的中文,并力求开发出一种国际语言 *Mundono*,这种语言比世界语容易学一些。怀着这样一种想法,我在大学时就专攻法语和西班牙语。同时,由于我常常对思想感兴趣,因此,我又上多门哲学课,但只上一门历史课。渐渐地我对比较文学产生了兴趣,在芝加哥大学德语系攻读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后来,在我重新回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之前,我跟随一些在纽约市的新社会研究学校工作的德国逃亡学者学习社会学和哲学,并在联合神学院听讲座。不过,尽管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首次修了一些历史课,但所研究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在一个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委员会里工作。就这样,我没有被训练成一名历史学家,而是成了思想史和文化史学家。和那种强调政治的传统历史写作形式相比,我更喜欢这样一种历史写作的方式。我不能回答你关于本体论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在我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工作范围内这意味着什么。就方法论而言,传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的工作与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注重档案资料,我很少使用档案材料。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文学研究比较接近。我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不感兴趣,而是对个人、社会以及文化以某种方式行为的动因感兴趣。在这里,我对这种东西的依赖近似于文化人类学。和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这样的

极端文本主义者不同,我相信文本的解释有一定的标准,而不是任意的,但我认为我们所研究的文本的作者是希望传达某种意思的。因此,虽然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文学科学(literary science)比较接近——在这里我是按德语“科学(Wissenschaft)”的意义来使用“科学(science)”一词的,德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承认文学研究不是像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不管怎样,它还是需要系统的探究——我并不认为我所研究的文本是像海登·怀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纯属想像的、和小说作品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我努力地认真对待文本。我的研究越来越转向对历史文本的研究,不是研究兰克意义上的过去,而是研究如何解释过去。

贺五一:您已经在比较历史编纂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众多历史编纂学派中,您最喜欢哪一种学派?为什么?

伊格尔斯:我本人并不认同某个特别的历史编纂学派,我认为任何历史学派都不是完美的,任何解释过去的努力都不能重建真实的过去,而只能是反映历史学家的观点,反映他或者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背景,反映塑造他或者她的社会和文化。我相信,不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派都对我们理解历史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贡献也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有时候,贡献是由像吉本、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这样的历史学家做出的,他们完全独立于任何“学派”,实际上,当我谈起历史学派时,我是非常小心的,即使是谈起像法国的“年鉴学派”这样的组织化了的学派时也是这样。“年鉴学派”由众多历史学家组成,他们的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曼纽尔·勒华·拉杜里,他紧紧依附于年鉴学派,其著作《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年)采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来重现一个大的地区客观的结构变化,而九年以后,他在对一个拥有200人的中世纪的村庄的描述中,却采用了村民们的证言来重建他们的生活经历。在20世纪的历史学家中——或者如你所说的历史学派中——我对年鉴学派的评价比较高,因为他们有比较宽泛的学科方法,而且对新的方法持开放的态度,但我也认为他们是有局限的,他们专注于相对稳定的前现代社会,而不能面对现代工业时代的历史问题。他们可能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很多东西,比如承认社会冲突的中心地位以及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贺五一:2008年,您和王晴佳合作出版了《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这部书应该是第一部从全球角度研究史学史的著作,你们当时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您认为世界史和全球史有区别吗?如果有,您认为区别在哪里?据我所知,你们打算对这本书进行修改,能具体说说你们将怎么修改吗?

伊格尔斯:几乎所有的历史编纂史所关注的都是西方世界,因此我们试图写一部史学史,这部史学史所涉及的是帝国主义时代以及非殖民化过程中,西方世界之外的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以及西方和非西方的本土历史传统之间的互动,这实际上就是全球的历史编纂史。该书的最初版本出现于2008年,你知道,2011年中文版又面世了,原稿交付的时间是2007年,离现在已六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决定对该书进行更新,以便将最近的著作,特别是那些有关全球史以及全球化问题的著作也容纳进去。在该书的英文版中,我们对有些部分也不太满意,比如女性主义和性别的历史,我们全部重写了关于

历史和记忆的部分。此外,关于拉丁美洲史学部分,我们按照一些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的批评意见进行了改写,这些历史学家对原来英文版中的该部分提出尖锐的批评。

贺五一:最近,您与王晴佳合作,计划编纂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球视野》的书,您能详细地描述一下编纂该书的计划吗?

伊格尔斯:苏联解体以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学生运动时起,尤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仅限于学术研究,成为众多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方向,从而失去了其作为一种革命运动的作用,而在非西方的后现代社会里,这种革命运动的作用却没有完全消失。在王晴佳和我正在编纂的文集中,我们希望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对今天的历史写作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我们已经邀请了来自中国、日本、印度、朝鲜、土耳其、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学者来撰稿。在这个调查表的结尾,我们会加上我们的建议。

贺五一: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的,通过这种批判,他对工人阶级的穷苦生活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然而,二战以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普遍建立起来了,劳工的工作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效吗?

伊格尔斯:是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有效,但是是以改良的方式发生效力。很显然,资本主义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前殖民地世界的贫困问题。实际上,在二战后的30年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北美、西欧、日本的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前殖民地国家虽然获得了正式独立,但他们仍处于西方经济利益的统治之下。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福利制度的改善中获益的劳动大众不再认为他们处于下层社会或者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中产阶级。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大众的工资处于停滞状态,贫富悬殊加大,紧缩政策以牺牲大众为代价来让银行获利。很显然,新自由资本主义没有能够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严重。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没有提供答案。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受到马克思所预料的那种有效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运动已经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精炼概述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深深根植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世界的,现在已经过时了,没有过时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便如此,也必须对他的理论进行修改以将20世纪晚期以及21世纪早期的现实考虑进去,然而,这种批判却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来替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寻找这种替代物以求在民主的框架内达到更大的社会正义。

贺五一: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变化,很多人发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特别是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宣称人类历史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您对他的观点有何看法?您推测人类社会未来可能的趋势会是什么?

伊格尔斯:很显然,福山在1989年苏联形式的社会主义倒台时所发表的预言,随着从那以后的事态的发展,被证明是错误的。福山认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是历史过程的终结,这就正如黑格尔把他那个时代普鲁士王朝的复辟看作是历史的最后阶段一样。在福山看来,自由市场形式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紧密相连,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控制力已经伸向包

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世界各个角落,然而却没有导致更大程度的民主。1965年,我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我承认核时代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但是仍然乐观地认为更加公正的社会最终会出现,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我比以前悲观得多,我们期待着未来更加和平、社会正义的世界,但是我却切实地感到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自己所做的贡献非常之少。

贺五一:可能有一种常识就是,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原因,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历史事实中找出这些原因,并为现在和将来提供借鉴参考,这种历史研究的路径可以被称为因果研究法。在您的谈话中,您似乎反对历史因果研究法,为什么?

伊格尔斯: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因果研究法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解释某一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吗?就目前而言,应该能从作为历史变化行为者的人类的动机和目的中找到“原因”,尽管我们的解释可能不那么完美。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事件都有其原因。但如果你按照19世纪的思想家如孔德、马克思、贝克尔以及20世纪的亨佩尔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来理解原因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原因就几乎不能用于历史解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臆测。

贺五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思潮,它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一些历史学家把它看成一种毁灭性的力量,而且您也对它提出了反对,您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科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吗?如果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有正面作用的话,那么这个正面作用是什么?我注意到,您和海登·怀特虽然是长期的好朋友,但你们在历史观念上常常是相反的。我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争论之后,你们是否试图说服对方,并在一些方面上达成一致意见?

伊格尔斯: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负面的,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它是负面的。后现代主义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它把这两个观点推到极端。它重点对以经验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的科学至上主义提出了批判,并指出一切历史研究都存在主观因素。它强调一切历史中的文学方面,然而,海登·怀特或者雅克·德里达却认为历史仅仅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文学,本质上就是虚构的。应该承认,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像海登·怀特那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却否认真实过去的存在,认为过去只是一种语言的创造物,当怀特面对大屠杀这样一个事实时,他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和其他否认大屠杀的人不同的是,他承认存在大屠杀,然而,他的历史观念却不允许他作这样的设想。我也非常同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评,以及对欧洲中心论的拒斥,欧洲中心论认为现代西方世界是判断前殖民地文化的标准。但是,他们指责整个启蒙运动的遗产,尤其是指责其对人權的强调,对于这一点,我是反对的。虽然他们需要人权,但是他们的西方价值观没有给人权留下空间。海登·怀特和我是朋友,我们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有着相同的看法,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但是我们俩关于历史的理论观点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不认同他将所有的历史研究归结为纯粹虚构的文学以及完全否认研究中存在客观标准的做法,我承认客观性是有限的,但是仍然致力于理性的探索和研究。

贺五一: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主义的历史研究潮流,您在《全球史学史》一书中称这种潮流为“新文化史学”,您对这个潮流有何评论?您似乎反对文化主义的史学研究路径,为什么?您认为探索历史事实真相的可靠的和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伊格尔斯:你所指的就是所谓的“文化主义转向”。同样,和“语言学的转向”一样,它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但却走得太过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E. P. 汤普森)在内的历史学家开始强调文化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我认为这非常好,它是对用定量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无人的社会结构和变化的一种反制,使历史研究转向更加重视具体的人(表演者)的经验和文化。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方法没有什么错。我所批评的是以“文化转向”的形式专门从事文化研究,忽略了文化得以运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贺五一:据我所知,您反对历史进步论,在我们的谈话中,您表露出一一种对未来的悲观情绪,是什么使您对未来这样悲观?我注意到,在反击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要为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负责的指责时,您赞美启蒙运动是人类通向尊严的途径,它促进了人类摆脱控制与依附关系,达到了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但是启蒙运动是赞成历史进步论的,您如何调和您对未来悲观的情绪与启蒙运动乐观的历史进步观?

伊格尔斯:我想我已经在前面一个问题中很充分地回答了您这个问题。我当然希望看到世界向正义方向发展,但是,和我在上述问题中所讨论的经典的进步论的倡导者不同的是,我认为,历史的规律并不是像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指向进步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料的。我仍然相信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观,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的现实使我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贺五一:虽然历史学家的使命是研究过去,然而,仍有一些历史学家喜欢预测未来,而且一些人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很准确,您认为通过使用过去的资源可以预测未来吗?

伊格尔斯:未来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即使这种有限的预测的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相信那句经典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教师,即研究过去可以教会我们如何行动以及如何避免错误。我们可能会从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中吸取某些教训,但是每个历史的情景是不同的,因此,过去的教训从来就不能完全用来处理当前的问题或者预测未来。

贺五一:在您的年度总结信中,您说您非常担忧叙利亚的灾难,当我在布法罗和您一起时,您给我看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写的各国死亡率的统计资料,我发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非常关注人类的苦难,我想知道,您对人类苦难的关注是否与您一生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减少人类的灾难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伊格尔斯:这基本上是两个问题:我对人类苦难的关心是否与我的经历有关,以及我们在减少人类苦难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和其他具有良知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为我亲眼看到的以及从媒体上得知的人类的苦难而感到难过。我可能比其他许多人更容易受到感染,这不是由于我个人所经受的苦难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从儿时开始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就看到了其他人受苦。毫无疑问,这使我投身于政治与社会事业,这也是我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积极致力于消除民族的、种族的以及宗教的偏见的的原因。作为个人,我能做到些什么,这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我将凭我的良心做事。

贺五一:您曾经说过,您喜欢待在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德国政府和社会用诚实的态度对待过去,您能根据您的观察,向我们描述一下德国是如何诚实地对待过去的吗?

您认为德国的例子对东亚具有借鉴意义吗？

伊格尔斯:1961年,(我的妻子)威尔玛和我第一次在德国待了较长一段时间,那是西德。当时我们认为大部分德国人没有诚实地面对过去,大屠杀几乎没人提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曾经和纳粹勾结在一起,他推行一种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他确保给予那些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一些赔偿——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补偿,似乎这些东西是能够补偿的;另一方面,他又任命前纳粹成员担任他政府中的领导职务,那些在纳粹党中担任高级官职的德国人大部分都官复原职,这使许多以前曾逃离纳粹德国的重要作家和知识分子决定回到东德,而不是西德。东德谴责纳粹过去的暴行,但是认为希特勒政权与金融资本主义有关,而不去追究许多德国人支持这个政权的责任。20世纪60年代,随着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意识的增强,至少在西德,情况发生了变化。从现在起,人们对德国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检讨,对1933年以前为纳粹上台铺路的德国民主的缺失进行检讨,人们意识到所发生事情的恐怖性。现在,德国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媒体提醒他们,学校给学生讲授所发生的事情。这和日本以及中国形成对照。像石田雄治(Yuji Ishida)那样的历史学家对日本和德国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是日本政府不允许人们对日本过去的历史进行批评,而且学校教科书也不教授这个。同样,在中国有些事情也很少允许讨论。

贺五一:我注意到您非常关心种族问题,把种族平等看成民主的试金石,您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与您曾经参与小石城事件以及南部的民权运动的经历有关吗?您认为美国现在的种族和民主状况怎么样?如果美国有问题的话,您认为美国的问题是什么?

伊格尔斯:我对种族问题的关心和我参与小石城危机以及南部的的民权运动没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致力于种族平等,是因为在生活的早期我就参与了人权斗争。至于你提出的我如何看待今天的情况,我的回答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权运动以及当时的人权立法,极大地提高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地位,吉姆克罗时代(Jim Crow era)的种族隔离的障碍倒塌了,有色人种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我们现在才有了一个其父亲是非洲血统的总统,今天也有很多的黑人中产阶级。尽管如此,只有少数人生活过得比较好,大部分人仍然生活贫困,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贫民窟里。因此,今天学校的种族隔离状况几乎和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学校种族隔离违反宪法时一样。除了参军之外,几乎没有向上流社会流通的渠道。这些障碍是很难克服的。尽管今天许多美国人相信种族平等,但是种族歧视仍然普遍存在,这就使得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难以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不仅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反对,而且还遭到经济利益集团的反对,社会经济改革不足以弥合长期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历史所带来的创伤。放眼美国之外的世界,我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取得了我们美国仍然需要取得的进步,也许我刚刚访问过的古巴在消除种族不平等方面是个例外,然而,我对古巴了解不多,而且其进步是在独裁体制下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的。

(作者贺五一,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邮编:233030)

(责任编辑:姜 芃)

(责任校对:李桂芝)